

数字时代信息源发展的价值、挑战及治理研究

张鑫^{1,2}, 张层林³

(1. 河北大学 管理学院, 保定 071002; 2. 河北大学 燕赵文化高等研究院, 保定 071002;

3. 甘肃省图书馆, 兰州 730000)

摘要: [目的/意义] 对数字时代信息源发展现状、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治理进行探讨, 有助于网络社会的有序发展及信息源的增效。[方法/过程] 文章介绍了数字时代信息源呈现的主要特征, 剖析了信息源发展所带来的多维价值与系列挑战, 最后讨论了数字时代信息源的治理体系及发展趋势。[结果/结论] 构建了政府、社会组织、信息产品与服务提供者及公民个体等多主体组成信息源治理体系, 并从治理基本目标、核心内容、重要环节等方面阐述了信息源治理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 信息源; 信息源发展; 信息源治理; 数字时代

中图分类号: G25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1248 (2020) 07-0081-08

引用本文: 张鑫, 张层林. 数字时代信息源发展的价值、挑战及治理研究[J]. 农业图书情报学报, 2020, 32(7): 81-88.

Development Value, Challenges and Governance of Information Sources in the Digital Age

Zhang Xin^{1,2}, Zhang Cenglin³

(1. College of Management,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2.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of Yanzhao Culture,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3. Gansu Provincial Library, Lanzhou 730000)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It is helpful for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network society and the enhancement of information sources to discuss the curr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governance of information sources in the digital era. [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information sources in the digital age,

收稿日期: 2020-06-04

基金项目: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雄安新区发展视域下网络舆情风险评估与治理研究”(HB18TQ005);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政府购买公共信息服务的绩效评估研究”(15BTQ014); 保定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公众获取政府信息的渠道选择影响机制研究”(2018125)

作者简介: 张鑫(1985-), 女, 讲师, 河北大学管理学院, 研究方向为网络社会治理、健康信息学。张层林(1966-), 男, 副研究馆员, 甘肃省图书馆, 研究方向为阅读推广、信息传播

analyzes the multidimensional value and a series of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sources, and finally discusses the governance system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information sources in the digital age. [Results/Conclus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the information source governance system is composed of government, social organizations, information product and service providers and individual citizens, and expounds on the specific measures of information source governance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basic goal, core content and important links of governance.

Keywords: information source; information source development; information source governance; the digital age

1 引言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作为承载信息的信息源,其种类和形式更加多元创新。一方面,大量诸如在线社区、维基百科、官方媒体、自媒体等数字环境下的新兴信息源层出不穷^[1];另一方面,传统的电视、广播等媒介及人际信息源借助网络渠道进行载体创新,如《人民日报》拓展了政务微博、政务公众号、抖音等新的信息源形态。这些信息源作为新兴的信息承载以及知识传播的场域,为人们的信息获取、知识建构甚至情感支持等提供了重要条件。但是,通过对不同类型信息源及用户使用等分析发现,尽管数字时代信息源在多方面发挥着重要价值,但是仍然不可避免存在诸多问题,给中国网络社会的健康发展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所以,在当前数字环境下,信息源的管理、运营组织需要从多方面进行问题反思,探究特定情境下信息源的表现形式及规律,剖析信息源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深入思考信息源治理的手段、方法等,以促进其良性、持续发展,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社会价值^[2]。

基于此,本文梳理了数字时代信息源的主要发展形态及特征,剖析了信息源发展所带来的多维价值与困境,并进一步探讨了当前情境下信息源的治理框架及方法等问题。本文对国内外信息源相关研究进行了基于时代特征和实践发展的弥合,可对信息源的价值实现和社会推动提供一定指导借鉴意义。

2 文献回顾

信息源是一个海量、多元、动态信息的承载系统,是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医疗、教育等多领域组织或个人通过不同机制生产或加工的信息存储平台。近年来,学者们对信息源的价值认识和对信息源的研究进展不断深入,涌现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本文拟从信息源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信息源的分布领域及用户特征、信息源选择或利用的理论要素等方面对相关研究进行回顾。

(1) 信息源的相关概念和基础理论。信息源是指能够向信息主体提供其需要信息的来源物,既可以为物质世界中的事物,也可以是客观知识的记录,还可以是信息主体或其他人的头脑^[3]。信息源只有被客体感知到其存在和价值,并通过有效获取及意义建构才能体现其重要性^[4]。前期研究主要将信息源选择^[5]、信息源偏好^[6]、信息源利用^[7]等作为理论逻辑起点,对信息源的价值实现形式和质量呈现效果进行了不同方面的阐释。在研究过程中,不同学科范式下研究还立足于相关基础理论,对信息源的选择、利用等行为进行阐释和延伸,较为常见的基础理论如最小努力原则^[8]、成本-收益理论^[9]、社会资本理论^[10]、期望价值理论^[11]、交互记忆理论^[12]等。

(2) 信息源的分布领域及用户特征研究。近年来,诸多研究成果从信息源的领域内容、用户群体、用户特征及行为规律等多维度,对信息源的价值实现路径进行了深入阐释。如李月琳等^[13]探究了

大学生在搜寻就业信息时使用的信息源、使用特点及选择原因。谢娟等^[10]调研了城市和农村全科医生在信息源感知和偏好方面的差异,以及互联网信息的利用障碍等。罗毅辉等^[11]利用算法挖掘信息源分类的规则集合,并呈现了个人投资者信息源选择的模式和特征。这些研究成果立足于不断演化、细分的社会情境,对信息源及其与用户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有较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3) 信息源选择和利用的影响因素研究。前期较多研究探讨了信息源选择和利用的影响因素,主要围绕信息源的质、可获取性、任务和情境等维度。其中,信息源的质量因素往往被认为是信息源选择的最重要影响因素之一,相关研究将质量概念化为准确定、真实性、全面性、相关性、可信度、可理解^[2,9,10]等。同时,可获取性也被认为是影响信息源选择和利用的重要因素,其可进一步阐释为信息源获取所需的时间空间成本、社会资本^[2]等。而用户所处的情境或面临的任務则是信息源选择的动态影响因素,其可从情境或任务的复杂性、紧急性、重要性等方面影响信息源选择的行为或效果^[2,12]。

综上分析发现,前期研究侧重于探讨某类群体在不同领域、不同情境中的信息源选择行为,较侧重于微观层面的阐释。然而,在当前数字环境下,除了基于用户视角的信息源选择和利用研究外,还有必要从管理者、建设者的角度来剖析如何提升信息源被用户选择和利用的可能。基于此,本研究拟基于新环境下信息源的表现形式及规律,分析信息源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进一步探讨信息源治理的手段、方法等,以致力于提升信息源的社会价值。

3 数字时代信息源发展的特征

数字时代信息源的发展呈现更加多元、开放、融合的特征。传统的信息源在社会网络空间中单一节点的形式已经逐渐转变为多点融合的结构,并最终呈现“处处皆中心”的分布式网络传播结构^[13]。具体而言,数字时代信息源发展的特征如下。

(1) 信息源的内容方面,呈现个性化和同质性并存的特征。在信息源规模快速增长以及信息内容极大丰富的数字时代,信息源的开发建设取得较为明显的效果。在信息内容生成方面,持续运用互联网思维 and 用户思维,进行信息内容深度开发,满足用户对信息的个性化需求。但是,仍存在信息源开发和用户定位模糊,信息内容建设趋同现象,而信息传播飞速则进一步加剧了信息源之间内容复制、雷同等同质化的倾向^[14]。

(2) 信息源的可及性方面,呈现主动推送、双向交互性的特征。传统信息源往往呈现被动用户连接、单向信息传播的特点,一方面依靠用户主动展开信息搜寻行为来连接信息源本身,一方面单向将信息“推”给用户而难以和用户进行有效互动。数字时代信息源的开放、主动、去中心特性愈加明显,其进一步基于大数据计算、推荐机制等方法将信息主动推动给用户,并进行多元有效的实时互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信息的承载方和接受方的关系。

(3) 信息源的情境利用方面,呈现智慧化、多元化而特征。数字时代,信息源愈加重视基于移动互联属性的信息载体智慧形态发展,如依托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技术以及创新模式,开发信息源可视化、可体验等功能,除了使用户不受时间、空间限制获取信息外,不断强化用户在利用信息源的同时得到基于场景化的视觉、听觉、触觉以及良好的心理体验,以构建信息源的信息承载传播、基于连接提供服务的融合服务型平台^[15]。

4 信息源发展的价值与挑战

由于数字时代的信息源发展进一步呈现出多元化、去中心、智慧化等特征,其作为网络社会的各个节点,与社会系统中其他节点的交互、作用也愈加明显。这些交互作用一方面给网络社会的参与者带来更多的价值,然而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需要慎重对待,科学治理。

4.1 信息源发展带来的价值

(1) 数字时代人际信息源的线上联接性更强,弱关系人际信息源进一步拓展。作为社会信息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环境下人际信息源有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和发展。一方面,网络通讯技术的进步使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除了依靠面对面、电话、邮件等渠道以外,还包括QQ、微信、MSN等即时通讯工具,这突破了时空的限制,增加了人际信息源联接的便捷性与效率,并减少信息搜寻主体的花费;另一方面,人们的人际信息源往往也包括微博、论坛等社交网络平台认识的网友,以及微信群里的并不熟悉的“朋友”,这些都进一步扩大了人们可以连接的“圈子”范围;也就是说,除了强人际关系信息源以外,弱人际关系信息源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拓展。

(2) 数字时代网络信息源的全民参与程度更高,除了获取信息之外,还可能得到情感等支持^[16]。在Web2.0时代,个人不仅在线社区、问答平台、维基百科、微博等媒体信息源获取信息,同时在这些信息源中参与贡献信息。据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统计,2010年互联网在中国出现了历史性跨越,个体用户产生的网络内容流量超过了网站专业制作的内容流量,其中前者页面浏览占互联网总流量的50.7%^[17]。用户间通过参与、分享、合作和协调,不仅给信息源的多样化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也给信息源的运行成本和内容制作成本减轻负担。更高的参与程度不仅提高了用户选择和利用信息源的积极性,而且使用户在交互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情感支持。

(3) 数字时代信息源的发展提高了复杂信息任务的解决效率与效果。在当今社会,人们在工作、学习、生活甚至娱乐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信息任务,而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环境往往使人们信息任务的复杂性或困难程度不减反增。用户在完成复杂任务的过程中,时常需要更全面的诸如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类型的信息,此时一种信息源往往难以有效满足搜寻者的信息需求^[18-19]。而且,

有时人们并不知道自己所需要的信息源于何处,基于这种社会需求,更多问答平台涌现于数字环境中。所以说,在信息源的多元化、个性化发展的背景下,人们可以方便地通过不同信息源来相互补充、印证所需信息,这极大提高了复杂信息任务的效率与效果。

4.2 信息源发展带来的挑战

(1) 数字时代信息源的发展使用户面临新的风险或危机。具体包括隐私风险、财产安全风险、信任危机等。其一,数字环境下越来越多信息源需要用户登记个人信息才能开放使用的条款对用户的个人隐私安全存在一定风险,诸如黑客入侵、用户信息泄露等事件偶有发生。其二,数字环境下信息源的类型多种多样,用户选择利用某个信息源的过程中,有时在下载或点击后会弹出广告甚至病毒,其可能演变为网络诈骗并给用户带来财产安全风险。其三,数字环境下由于信息源中存在大量的谣言信息,一些违背社会客观事实的谣言信息导致用户产生社会信任危机,而一些辟谣信息则会使用户在一定程度上对信息源的真实性产生质疑。

(2) 数字时代信息源的发展加速了网络舆论的扩散。随着技术的突破性创新和信息环境的复杂多变,一方面,人们更加便捷地从各类网络信息源中获取信息;另一方面,他们也更容易将所获取到的信息传播于其他网络信息源中,在提供给网络信息源信息内容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诸如敏感社会事件、价值观不当言论等进一步散播,进而引起舆论发酵和事件影响程度升级等问题。如“雷洋事件”最早出现于知乎社区,然后被人大校友微信朋友圈转发,接着该话题信息进一步被散播于微博等多信息源中,即典型的“在线社区曝光—微信朋友圈小范围传播—微博发酵—媒体报道—新闻客户端打通最后一公里”信息扩散模式^[20]。然而,就目前技术水平,对不同类型的网络信息源进行系统全面监测还存在一定难度,相关部门对负面网络舆论的及时发现和有效疏解工作仍然面临挑战^[21]。

(3) 数字时代信息源的发展增加了网络社会秩序维持的难度。随着各类信息源数量与规模增大, 表现形式也愈加多样化, 逐渐演化成一个较为复杂的、多元化的信息生态系统, 甚至进一步加剧了信息冗余、信息过载、信息爆炸、信息污染等问题, 这对网络社会秩序的有效维持产生较大冲击和挑战。例如, 近年来兴起的网络直播平台上语言暴力、色情、侵权事件层出不穷, 如近年来斗鱼直播被曝光“造人”“阿怡代打”事件, LOLO直播出现了涉黄等一系列负面新闻。可见, 随着信息源的发展网络社会秩序的维持难度也进一步增加, 传统依靠单一政府治理社会和多种信息源的手段已经不足以适应当今时代的需求。

(4) 数字时代信息源的发展或进一步加剧了信息不平等。随着信息源的多元化发展, 网络社会愈加丰富多彩, 不同地域、种族、年龄、性别、教育程度、收入和阶层的人往往可以自由选择信息源并获取自己想要的信息; 然而, 这也加剧了世界分化和信息不平等^[21]。这是由于, 不同个体对优质或有效信息源的辨识选择能力及对高质量信息的分析和转化能力存在差异, 当今时代这些差异所造成的信息不平等愈加严重。如某新闻中提到“人大附中高中生利用网络在线课堂学习 Python 并获得竞赛奖项”, 而仍然存在很多中学生痴迷观看网络直播中不良内容。这种囿于环境和自身认知能力的局限性, 使网络社会信息源发展仍存在挑战。

5 数字时代信息源的治理体系

在谈及网络社会时, 许多研究均使用“治理”一词, 而非“管理”“管制”“控制”“统治”等术语。这是因为, 一些研究者认为“治理”是网络社会中仅有可行且有重要意义的管理策略和方式^[23]。俞可平指出, 很长时期以来, “治理”(Governance)一词与“管制”或“统治”(Government)同义^[24], 而在上世纪90年代后, 其不再仅限于政治学领域, 还被广泛用于经济学和社会学领

域。Stoker对“治理”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 ①治理是源于政府、但并不囿于政府的一套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主体; ②治理是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答案探索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界限; ③治理是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的权力依赖; ④治理指参与行为者最终会建构一个自主网络; ⑤治理指在社会事务管理过程中, 存在多元化管理方法和技术, 政府有义务运用新方法、新技术来调控和引导社会事务^[25]。

不管是承载各类数据信息的网络信息源, 或是存有多样知识经验的人际信息源, 还是多元化的其他信息源, 都是社会系统或社会子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前所述, 信息源的发展给社会和人们带来了新的挑战, 诸如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舆论的扩散, 增加了网络社会秩序维持的难度, 同时给用户带来了新的风险或危机, 也进一步加剧了信息不平等。所以, 对信息源的有效治理成为当今社会亟待重视和解决的问题。结合前文对信息源发展情境以及个体信息源选择等分析结果, 下文将从治理主体及框架、治理对象及方式等方面进一步探讨网络环境下社会信息源的治理问题。

5.1 信息源治理的主体及框架

本文认为, 社会信息源的有效治理离不开全面、多元的治理主体, 后者具体包括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主体与公民个体等, 最终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的社会信息源治理主体框架。

(1) 社会网络中心节点的政府。政府既是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主要平台, 又是制定公共政策和信息政策的权力单位。一方面, 从国家层面对多种信息源、尤其是多种网络信息源进行监管和治理。目前, 中国互联网治理形成了以国家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为核心,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中国计算机网络应急处理协调中心(CNCERT/CC)等机构为辅助, 公安部公共网络安全监察局等为打击部门, 构建了一套多层级的网络监管体系。另一方面, 制定了互联网治理的法律体系, 例如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上网营业场所管理条例》《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信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除此以外，自上而下的多级政府还有义务把控信息社会和网络社会的文化发展方向，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并协调政府、组织、企业与公民等各类社会主体的网络社会活动^[26]。

(2) 参与基层治理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在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社会结构中起到润滑剂的作用。例如作为重要行业协会的中国互联网协会，汇集了国内多家网络运营商、设备制造商、服务提供商以及科研、教育机构，致力于推动互联网内容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是政府监管的重要补充。该协会先后发布了《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互联网站禁止传播淫秽色情等不良信息自律规范》《抵制恶意软件自律公约》《博客服务自律公约》《反网络病毒自律公约》《中国互联网行业版权自律宣言》等一系列自律规范，并先后成立了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网络违法犯罪举报网站、12321 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12390 扫黄打非新闻出版版权联合举报中心等公众举报受理机构等^[27]。

(3) 作为信息产品与服务的提供者，企业在社会信息源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当代社会，互联网企业是重要的信息源治理主体，通过把关、过滤、选择和凸现的方式，引导舆论走向并影响社会价值观的塑造，对于社会建构与文化变迁具有重要影响。例如，2016 年微信公众平台辟谣中心累计加入辟谣机构 470 多家，类型涵盖政府、媒体、专业组织机构，覆盖食品安全、医疗卫生、公共安全与服务等领域，科普次数超过 160 万，处罚造谣账号约 10 万个，发表辟谣文章超过 60 万篇^[28]。

(4) 作为散布于社会网络中的多个子节点——公民个体。当代社会是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的混合体，生活于其中的公民既可以是社会内容和信息源内容的创造者，同时也可以作为社会网络和信息源

秩序的维护者。从全民治理的角度，应重视每一个现实与虚拟网络中的公民的微观主体作用，这是对公民个体治理的赋权与信任，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治理的全面性和效率性。

5.2 信息源治理的对象及方式

信息源治理的对象即为信息源本身，主要由多种类型的信息源载体、信息源的内容与信息源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构成。

(1) 信息源平台的有效、有序发展是信息源治理的基本目标。治理信息源按照载体不同可以划分为人际信息源、组织机构信息源、传统媒体信息源、网络信息源等多种类型，而这些信息源无疑都是当今时代治理的对象。由于信息源治理属于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子系统之一，也应遵循现代社会治理的价值追求，诸如绝大多数成员的平等权利与福祉、基本的伦理道德与规范。本文认为，具体的信息源载体治理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其一，以满足人们信息需求、提高用户可获取性为基本目标。如前所述，由于人们选择信息源可能会受到诸如物理距离、经济成本、时间因素、操作技能等信息源载体可获取性的影响^[2]。基于此，为了提高信息源的可获取性，信息源有必要清晰定位，并在距离、经济、时间和操作方法等方面为目标用户和潜在用户尽可能提供便捷。其二，由于网络欺诈、网络传销、网络病毒、侵犯知识产权的社会行为和网络行为屡见不鲜，并往往借助于特定载体平台。所以信息源运营平台有必要约束自身行为，使自身作为信息载体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

(2) 信息源承载的信息质量是信息源治理的核心内容。信息源按照内容可以分为教育学习信息源、科研学术信息源、医疗健康信息源、资讯新闻信息源、购物消费信息源等，这些载有不同领域内容、服务于不同情境任务的信息源仍然需要科学、统筹治理^[29]。具体而言，一方面，由于人们选择信息源会受到诸如可靠性、相关性、时效性、覆盖范围等信息质量层面的影响^[2]，所以，作为提供信息

内容的信息源为了提升被选择概率,有必要充分考虑自身所承载的各类信息的真实、可靠等条件,尽可能站在用户的视角考虑信息源的利用效果。另一方面,由于单一信息源往往难以作用承载全面领域信息内容,所以可以尝试在政府或行业组织的协调下,信息源之间建立协调、合作机制,提高资源建设的特色化和互补性,并取得互惠和相互借鉴的效果^[28]。

(3) 信息源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是信息源治理中的重要环节。信息源在发展的过程中遇到虚假信息泛滥、信息使用不当、语言使用不规范、负面舆论传播、不良信息骚扰等诸多问题,出现了诸如传播谣言、隐私泄露、网络暴力、人肉搜索、煽动舆论、植入广告等大量严重影响信息源价值和社会秩序正常运行的事件。对信息源的治理除了从载体和内容方面进行引导、协调、监督和管控,还应对信息源发展过程中的特定事件进行专门的回应和干预,减少造成社会危害^[30]。

6 结 语

未来,相关研究有必要持续探讨社会情境演化过程中信息源的影响和治理问题。从治理主体方面,可以进一步挖掘调动多主体参与网络社会治理、信息源治理的方法和途径,通过全民参与来维护信息源秩序。从治理过程方面,还需加强信息源治理创新过程中的协同化研究,如探讨多元治理主体之间、信息源与信息源之间协调与融合的影响机制等,通过节点间高效协同来进一步提升信息源治理的效果。从治理技术方面,持续探究改善信息源治理水平的智能化技术,诸如数据挖掘、数据监测、数据共享等提升信息源生成内容及运行质量的技术,同时进一步研究更智能的应急反应技术,提升政府及相关部门在特定事件情境中的信息处理能力。

参考文献:

[1] OH S, WORRALL A, YI Y J. Quality evaluation of health answers

in Yahoo! answers: A comparison between experts and users[J].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1, 48(1): 1-3.

[2] 王芳,张鑫,翟羽佳.国内外信息源选择研究述评及一个整合的理论模型[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7,43(2):96-116.

[3] 于良芝."个人信息世界"——一个信息不平等概念的发现及阐释[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3,39(1):4-12.

[4] 宋士杰,赵宇翔,宋小康,等.信息源对数字原住民健康信息可信度判断的启发式实验研究[J].情报学报,2020,39(4):399-408.

[5] 李月琳,闫希敏.大学毕业生就业信息搜寻行为研究:信息源的选择与利用[J].图书情报知识,2015(5):57-65.

[6] 周密,于玲玲,王德凯.工作任务情境下成本、收益对信息源偏好影响的实证研究——个体学习导向、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J].软科学,2015,29(12):92-95.

[7] 朱本军.全球视野下的公共文化学术信息源及其利用研究[J].图书馆建设,2019(5):6-12.

[8] 周文杰,闫慧,韩圣龙.基于信息源视野理论的信息贫富分化研究[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5,41(1):50-61.

[9] 李月琳,闫希敏.大学毕业生就业信息搜寻行为研究:信息源的选择与利用[J].图书情报知识,2015(5):57-65.

[10] 谢娟,张媛,成颖,等.城乡全科医生信息源与互联网信息障碍比较[J].图书馆论坛,2020,40(2):90-98.

[11] 罗毅辉,熊曙初.个人投资者信息源的选择模式与特征[J].情报杂志,2015,34(12):152-158.

[12] 谷蓓蓓,王新.面向事件的微博信息源认可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7,40(4):117-122,127.

[13] 郭春侠,刘惠,储节旺.新媒体环境下网络舆情治理大数据能力建设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8,41(12):46-54.

[14] 兰孝慈,王江.图书馆受众注意力资源同质化背景下差异化突围的路径选择[J].情报资料工作,2013(4):87-90.

[15] 林松涛."大数据+AI"赋能全媒体智慧升维[J].传媒,2019(22):22-23.

[16] 张鑫.在线健康社区用户参与行为的类型及偏好研究[J].情报资料工作,2019,40(5):84-91.

[17] 王文.WEB2.0时代的社交媒体与世界政治[J].外交评论,2011,28(6):61-72.

[18] JULIEN H, MICHELS D. Source selection among information seek

- ers: Ideals and realities. [J]. Canadia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 library science, 2000, 25(4): 1-18.
- [19] AGARWAL N K, XU Y, POO D C C. A context-based investigation into source use by information seekers[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1, 62(6): 1087-1104.
- [20] 袁野, 兰月新, 夏一雪. 大数据环境下涉警网络舆情风险建模与实证研究[J]. 新媒体研究, 2018, 4(5): 1-6.
- [21] 李彪. 社会舆情生态的新特点及网络社会治理对策研究[J]. 新闻记者, 2017(6): 66-71.
- [22] 于良芝, 周文杰. 信息穷人与信息富人: 个人层次的信息不平等测度述评[J]. 图书与情报, 2015(1): 53-60, 76.
- [23] 何哲. 网络社会的基本特性及其公共治理策略[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14(3): 56-66.
- [24] 俞可平. 治理和善治引论[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1999(5): 37-41.
- [25] 格里·斯托克, 华夏风. 作为理论的治理: 五个论点[J].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1999(1): 19-30.
- [26] 柯平, 宫平, 魏艳霞. 我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研究评述[J]. 国家图书馆学刊, 2015, 24(2): 10-17.
- [27]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互联网行业自律规范(公约)汇编[EB/OL]. [2016-05-30]. <http://www.miit.gov.cn/newweb/n1146295/n1146592/n3917132/n4062282/n4062289/n4062306/n4062309/c4124512/content.html>.
- [28] 王芳. 论政府主导下的网络社会治理[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7(7): 42-53.
- [29] 张鑫, 王丹. 基于扎根理论的个体医疗健康信息源选择行为影响因素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 2018, 62(14): 5-13.
- [30] 张元, 孙巨传, 洪晓楠. 新时代网络社会的发展困境与治理机制探析[J]. 电子政务, 2019(8): 40-49.